

云冈石窟的开凿与北魏佛教的传播

◆高美云

【摘要】中国南北朝时期战事频繁,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导致了佛教的迅速发展。南北朝时,僧尼人数大增,寺院经济急剧膨胀,佛教学派南北林立,石窟大量开凿,僧官制度建立。北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,统治阶级对佛教的信仰和利用,更是佛教发展的直接动力。文成帝复法导致云冈石窟开凿。云冈石窟按风格和时间可分为三期:第一期是文成帝期间的昙曜五窟,第二期是孝文帝时期开凿的,第三期是北魏迁都洛阳前开凿。

【关键词】北魏 佛教 云冈石窟

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,宗教曾被视为人类社会各种文化形态的神圣之源。中国的文化光辉灿烂,宗教种类繁多。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,乘魏晋南北朝政治、文化动荡之机,在中国生根开花并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,从而影响了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与艺术的发展。云冈石窟的开凿即是其中一例。

公元386年,鲜卑族首领拓跋珪统一华北,立国号为“魏”,史称“北魏”。公元398年,道武帝拓跋珪将国都从盛东迁至平城,迄孝文帝太和十八年(公元494年)再次迁都洛阳,其间大同作为北魏的政治、文化的中心,长达九十六年。拓跋珪原居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与大兴安岭北段间,与西域并无来往,所以佛教并未传入。草原游牧民族,对外来文化——佛教有一种认同的亲切感。为了巩固军事胜利的成果,对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相对发达的人民实行统治,需要一种宗法性宗教显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,因而他们终于选择了佛教。

统治阶级的信仰和利用,是北魏佛教发展的直接动力。道武、明元二帝在位期间对佛教就很推崇。太武帝早年也曾信佛,后来受寇谦之的影响转信道教,由于在佛寺中发现叛军武器,加之崔浩从中煽动,遂有公元446年太武灭佛之举。景穆(太子晃),文成父子所交游的人大都是禅师。公元452年文成帝即位恢复佛教后,僧人、寺庙数目代有增加。献文帝在位六年(公元466年—471年)就禅位于太子弘(孝文)后移居北苑崇光宫,览习玄籍,但确实于佛义有研究的还是孝文帝。孝文帝的祖母冯氏也信仰佛教,所以云冈石窟的第二期有很多双窟和二佛说法像,这与当时尊奉孝文帝和冯氏为“二圣”有关。

中国的僧官制度就是在佛教兴盛,寺院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。道人统是北魏僧官最早的名称。目前见于僧传的道人统有法果、沙达、师贤诸人。北魏的中央僧官机构先称监福曹,到孝文帝时昙曜为沙门统(昙曜亦是云冈第一期石窟开凿的主持者)。僧官衙署改为昭玄寺,统管天下僧务。在朝廷中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,与光禄寺、卫尉寺并列,直接听命于皇帝,并不隶属于任何官衙。最高僧官沙门统由皇帝任命,而下级僧官的选拔之权则全在昭玄寺。此时的佛教已成为既有宗教性质,又有政治、经济性质的国家机构。

佛教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佛教经典。南方最有影响的译师是真谛(佛教史上的四大译师之一)。而北方早期影响较大的译师是昙无讖(公元385—433年),天竺人,后在北京译《大般涅槃经》40卷。北魏译经僧中最著名的是菩提流之,北天竺人。所译佛经有《十地经论》、《入楞伽经》、《佛名经》、《金刚般若经论》等。北魏的译僧还有昙摩流之,勒那摩提等。南北朝时的译经数量繁多,品种齐全,基本上反映了佛教在其发源地的发展水平。

总之,佛教具有较高的信仰素质,深奥思辩的哲学理论和形象生动的传教方式,因此它能够适应当时不同阶级人们的不同需要,迅速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下根。

佛教的传播不但依靠佛教经典而且还依靠佛教造像来解释教义,所以中国人又把佛教称为象教。

北魏太武帝的灭佛运动刺激了后来佛教的快速发展。文成帝即位下诏复法,复法的直接结果,便是云冈石窟的大规模开凿。云冈石窟始开凿于公元453年,石窟位于山西大同旧城西十五公里武州山。云冈石窟按其开凿时间及造像风格可分为三期。

太祖帝灭北凉后迁凉州僧徒三千人及宗族吏民三万户于平城,其中包括高僧师贤、昙曜以及著名雕塑家蒋少游。昙曜以禅学见称,太子晃、太傅张潭和尚书韩万德分别以师礼待之。文成帝复法后,昙曜为沙门统,《魏书

·释老志》云:“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”(公元453年),……于京城西州塞凿山石壁,开凿五所,镌建佛像各一,高者七十尺,次者六十尺,雕饰奇伟,冠于一世。这就是“昙曜五窟”。这五窟的造像艺人大部分来自凉州,而凉州的禅学对北魏佛教也有着直接影响。

云冈石窟的许多重要窟开凿于孝文帝期间,这就是第二期石窟(公元465—494年)。同第一期石窟相比,此时无论是石窟形制还是形像题材,都有了较大的不同。出现了一种清秀雍容,意匠丰富,雕饰奇丽的新风格。云冈石窟乃至北方石窟的中国化,也就在这一时期出现。孝文帝即位,北魏皇室,贵族崇福祈福也愈演愈烈。佛教在北魏统治集团的提倡下,发展迅速。第二期窟室,龕像的数目急剧增多,据现存铭记,开凿功德主除皇帝外,尚有官吏,上层僧民,在俗的义邑信义等,表明这时云冈石窟已不限于皇帝开凿,而成为北魏都城附近佛教徒的重要宗教场所。

第二期开凿的石窟,主要有五组:七、八窟,九、十窟,五、六窟,一、二窟,此四组为双窟。另一组包括十一、十二、十三窟。其中双窟居多,与当时尊奉孝文帝、太皇太后为“二圣”有关。窟制有佛殿窟和塔庙窟两种。这一期造像题材丰富多样。五、六窟大佛都采用了当时南朝士大夫地主阶级的常服式样。孝文帝时期提倡佛教义理之学,重视《法华经》、《维摩诘经》,一、二窟就是明确根据这两部经书开凿的。这一期造像气势不如前期逼人,而是加强了和颜悦色之感,菩萨、供养人,飞天雕塑得特别成功。第六窟中心舍利塔上的八躯供养菩萨,含情浅笑,矜持娇憨。第七窟拱门内壁由于有六个高浮雕供养像,虽为跪式但帔帛飘扬,通体跃跃欲动,显示出青春活泼与欢愉,被人称“六美人”像。

第三期石窟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,正始、延昌年间开凿的(公元494—524年)。这时的云冈石窟已不是皇帝礼佛,大修功德的地方,只有一些官吏,士民,僧人进行小规模开凿。主要分布在二十窟以西的四、十四、十五、二十一窟以及二十一个主要大窟之外中小窟龕。这一时期石窟以单独的形式出现多不成组。洞窟为中小型,有塔洞、千佛洞、四壁三龕式和四壁重龕式。这一期造像的现实性更加强了,佛和菩萨都演化成了中国人像的雕刻,而且许多龕都是个人为亡者祈福,为生者求平安。延昌、正光年间的铭记中,出现了愿“托生净土”,“愿托生西方妙乐国土,莲花化生”和“腾神净土”之类的祈求。这表明原来流传于南方的净土信仰,已开始在平城得到较大的传播。这一期造像艺术更臻成熟,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艺术风格。

佛教在北魏时,佛经流通有四百一十五部,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,僧尼有两百万,寺庙有三万余所,可知佛教在当时发展之兴盛。而其丰富多彩的宗教幻想给雕刻艺术注入了活力,使我国雕塑艺术转而以表现佛与诸神为主,风格也变得庄严富丽,精巧圆熟,形成所谓的云冈模式,成为魏国领域内兴凿石窟所参考的典型。所以,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,西到陕、甘、宁各地的北魏石窟,无不有云冈模式影响的痕迹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牟钟鉴,张践.中国宗教通史.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1997.
- [2] 孙振华.中国雕塑史.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,1996.
- [3] 汤用彤.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.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7.9.
- [4] (梁)释慧皎.高僧传.中华书局,1992.
- [5] 魏书·释老志.中华书局,1974.
- [6] 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.中国石窟·云冈石窟卷.文物出版社,1994.
- [7] 宿白.中国美术全集·云冈石窟卷.文物出版社,1988.

(作者单位:山西太原科技大学)